

《北京周报》的毛泽东思想对外宣传研究

张 放

【摘要】从创刊之日起,《北京周报》就肩负着向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任。“文化大革命”开始前,该刊主要以转发社论、声明以及配发相关报道、评论的方式宣传毛泽东关于世界局势和秩序的看法。“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北京周报》一度在毛泽东思想的外宣上呈现出激进状态,力图凸显仪式感;随后根据国外读者反馈,中共高层对这种宣传方式进行了干预。《北京周报》在毛泽东思想对外宣传过程中遇到的困境是整个外宣工作的缩影,可以从认知、意识形态和对外交往观念等三个层面加以理解。

【关键词】《北京周报》;毛泽东思想;对外宣传

【作者简介】张放,上海外国语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上海 200083)。

【原文出处】《中共党史研究》(京),2017.8.65~77

【基金项目】本文是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9批面上一等资助项目(2016M590374)的阶段性成果。

在新中国文化史研究中,对外宣传无疑是一个重要话题。研究者的探索路径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从宏观层面综述外宣历史,以期在较长时段中勾勒其种种变化^①;二是从微观层面切入,通过钩沉档案,以个案的形式呈现外宣工作的进展^②;三是围绕某一主题,探讨该主题的对外宣传状况。在第三种路径中,毛泽东思想是引起学者较多关注的一个主题^③。目前,论者对毛泽东思想对外宣传的研究与介绍多聚焦于毛泽东著作的翻译与发行^④。诚然,这是毛泽东思想对外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另一个关键渠道却较少被研究者提及,即由新中国发行的主要针对海外读者的外文刊物。不同于毛泽东著作中的革命主题,这些刊物追求时效性,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多与新中国的内外事务相关。另外,刊物的宣传形式更加多元、活泼,可以对早已定稿的著作内容形成有效补充,并反映出宣传思想的变化。

基于外文刊物的上述特点,本文拟对其中极具代表性的《北京周报》(Peking Review)进行分析,观察该刊1958年至1976年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方式方

法。之所以选择《北京周报》,乃因其系一份“政治性强、具有权威性的刊物”,编辑方针由中共中央外事小组与中共中央理论小组共同指导确定,在同时代的几份外文刊物中规格最高^⑤。可以说,这份刊物旨在传递官方声音,通过对它的考察,可以较为清晰地展现出官方关于毛泽东思想对外宣传的认知与操作,有助于透视毛泽东时代对外宣传的官方实践,进而更深入地理解外宣工作所面临的困境。

一、《北京周报》的创办及其肩负的外宣任务

新中国的对外宣传工作是在冷战格局下展开的。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为掌握对外宣传的主动权,一方面要求与新中国无外交关系国家的记者停止以记者身份活动^⑥,并着手取消外国在华办报权^⑦,另一方面开始建立自己的对外宣传网络。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外宣传的任务主要由国际新闻局负责。该局隶属新闻总署,于1949年8月开始筹备,10月正式成立。乔冠华和刘遵棋分任正、副局长,冯亦代任秘书长。^⑧国际新闻局的外宣任务主要包括编译法令、领导人著作,发行英语、俄语《人民中国》半

月刊和世界语《人民中国报道》月刊,以及开设英语广播并出版《每日英文电讯》。1952年7月1日,国际新闻局改组为外文出版社,将英文广播等业务转交新华社,此后专门负责外文书刊的出版与发行工作。^⑨截至1952年,《中国建设》《人民画报》《中国文学》相继创刊,外刊宣传网初步形成。

这一阶段,外刊宣传主要围绕实际工作与时事热点展开,通过报道工农阶级地位提升、新中国恢复与建设成就以及抗美援朝运动中群众不畏美帝强权的精神风貌等内容,展现出新中国的积极变化。采取这种报道方式,首先与当时的宣传观念密不可分。1950年3月,胡乔木对新闻工作提出批评,认为内容过于枯燥沉闷,没有考虑读者的需求,并强调今后应加大对新生活的报道,引导读者关注新中国的建设工作^⑩。此后颁布的一系列宣传指导文件大多体现了这种宣传观念^⑪。此外,通过宣传具体工作来展现新中国变化的方式也得到外宣从业者的普遍认同。近代以来,尤其在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在外国人眼中主要以负面形象呈现,很多关于中国的看法和判断都建立在偏见与不实报道的基础之上,世界缺少对中国和中共全面、深入的认知^⑫。因此,在外宣工作者心中,最迫切的任务就是通过具体案例向世界宣传“中国人民的翻身”,宣传“国家在怎样除旧更新,创建一片繁荣昌盛、自由民主的新天地”^⑬,从而让国外真正了解这个国家的现状以及被种种传说和流言遮蔽的新政权^⑭。

对具体问题的宣传生动、有说服力,能够吸引读者,却无法取代理论宣传的地位。不过,新中国成立初期,无论是国内还是对外,理论宣传都是一块“短板”。内宣方面,在1951年中共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指出,理论宣传力度不够,有待提升^⑮。在此前后,中央数次指出这一现象^⑯,但收效不大,实践中仍然偏重对具体问题的宣传。到了1954年,陆定一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草案)》,在关于该草案的说明中,他依旧批评理论宣传薄弱,指出应该加强对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党的总路线、决议和政策的宣传^⑰。理论宣

传问题同样困扰着外宣工作。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深感已有外文刊物无法系统化、理论化地将中国对国际问题的立场、观点向全世界传播,而这与新中国日益提升的世界地位不相匹配^⑱。于是,在强调理论宣传的氛围中,一本新的外文刊物正在酝酿。

1956年初,外文出版社表达了计划出版时事政治性英文周刊的想法。1957年,外文社副社长吴文焘进一步解释了创办新刊的必要性。他认为,现有刊物的宣传内容具有一定的重复性,而对理论问题的宣传却很少过问。同年年底,张闻天明确了新刊的定位,强调突出理论性:“以研究中国问题的读者为对象,不赶热闹,不重兴趣,不追逐时事,不追求销路”;“着重介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经验,解释我国政府的重大政策,提供必要的资料 and 文件,并适当反映我国对国际事务的观点和态度”。后经周恩来批准,新刊最终定名为《北京周报》,并于1958年3月4日正式出版,力图兼顾理论性与时事性。《北京周报》的创刊体现了强调理论宣传的观念转变,弥补了外刊类型的“短板”。该刊成为新中国官方声音传递的正式渠道——从理论层面阐释中国政府的重大政策,展现中国政府的立场,记录新中国的发展历程,并提供相关资料文件,表达中国对国际事务的观点与态度。^⑲

二、创刊初期高调宣传毛泽东思想(1958-1960)

从1958年到1960年,新中国的宣传思想和实践随着社会环境一起经历了迅速激进化、政治化的过程,《北京周报》从创刊伊始就在这种政治氛围中开展工作。1959年初,陆定一在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当下各级宣传部门要“掀高潮,鼓干劲”^⑳。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认为“右倾思想”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危险,要求各级党组坚决反对这种思想,并鼓足干劲、坚持总路线不动摇,传播积极情绪^㉑。新闻宣传机构很快做出回应,12月初,中共中央批准《人民日报》关于宣传问题的请示,要求各部委、党组、省市区党委遵照执行。请示提出:要克服“抢新闻”的作风,“一切必须服从

政治”^②。在“反右倾”运动中,外文出版社原有领导班子都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集体被边缘化,社内气氛非常紧张^③。编辑们表达观点的渠道不再畅通,很多人的积极性受到打击,只能机械地强调政治性,紧跟指示行事^④。1960年,中央对书刊中涉及政治的内容更加重视,开始要求中央级的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类出版社进行书刊审查,着重检查政治思想纰漏和政治事故。不仅要发现错误,还要追究责任,并发动群众进行批判,这给出版者带来了比较大的压力。^⑤外文出版社也进行了书刊检查,外宣工作进一步受到束缚^⑥。

宣传政治化趋势加强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开始在舆论上强调毛泽东思想的价值。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本人对“毛泽东思想”一词的使用非常谨慎。从1952年开始,他数次对舆论机构做出提醒或批示,要求淡化这一提法^⑦。但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毛泽东思想的“世界意义”凸显。斯大林逝世后,社会主义阵营的格局随之调整,中国以及毛泽东的地位日益提升,这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就已体现出来^⑧。1958年之后,中共在接待外宾,特别是外国共产党代表时,开始向他们介绍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与经验^⑨。几年间,毛泽东逐渐积累了对中国模式的信心,而这种信心主要源自“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他看来,这两场运动及其背后的理论支撑无疑具有原创性,不仅可以迅速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而且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发展模板和思想资源,其实践和理论意义并不局限于中国。于是,中共开始有意识地将基于本土实践的中国经验以及支撑该经验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向外推广,进行一次普遍主义化的尝试。毛泽东在1956年面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就曾表达过中国对人类的贡献与其人口比重不成比例的焦虑^⑩,而向世界传达中国经验及其理论无疑可被视为中国为人类做出贡献的一种努力。当时,党内多数干部都被激昂的情绪所感染,认为“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国际普遍真理的意义”,提出要“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跟好、学好、做

好”^⑪。从1958年起,中共在提及毛泽东思想时,更加强调其在国际层面所具有的意义,把毛泽东思想视为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对抗时代的马列主义,将其价值置于冷战格局中进行解读^⑫。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周报》必须担负起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世界意义”的任务。但是,过于政治化的宣传环境对该刊的运作产生了一定限制,加之以理论宣传为重任,编辑部显然不能对理论本身进行自由发挥,因此在创刊初期,《北京周报》主要通过转载《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文章的形式展开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例如1958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文,随后中央要求党内外各级干部和人民群众学习毛泽东的相关论述^⑬。《北京周报》紧跟形势,分两期全文刊登该文,呼吁外国读者“认识革命力量和反动力量”的问题,并向全世界宣布:“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有如夕阳西下,社会主义和为社会主义所支持的民族革命运动,却正如旭日东升。”^⑭

1959年,《北京周报》被明确要求“经常选登党和政府的重要文件,《红旗》和《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和专论”^⑮,自主安排宣传内容的空间进一步被挤压。该刊全文转载了《红旗》杂志刊登的林彪《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一文。文章从军队在新中国的变化入手,介绍了毛泽东关于军队建设的若干观念,最后指出毛泽东思想对建设社会主义、促进世界和平局势的意义,向国外读者宣传了毛泽东思想的“时代价值”^⑯。同时,《北京周报》还从《红旗》杂志转载了毛泽东与美国共产党名誉主席福斯特的通信。福斯特向毛泽东介绍了美共的处境,毛泽东在回信中批评美国当局对中国和世界人民的伤害,并在统治集团和美国人民之间做出了区分,最后辩证地分析了美国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博弈的现状与趋势^⑰。这封回信反映出毛泽东对其他国家和地区革命形势的判断和指导,与当时的宣传任务相契合。

这一时期,由于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

分歧,中苏关系开始出现裂痕。苏联不断对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提出不同意见,中方也相应地做出回应。例如从1959年起,苏联数次对中国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给予批评^③,得知苏联方面的态度后,毛泽东立即表示要向苏联以及中共党内的反对派、怀疑派宣战,“要向全世界作战”^④。在共产主义革命的传统中,不同政党之间的分歧与对抗,往往直接地表现为意识形态层面的冲突,谁赢得了意识形态论战的胜利,谁就更有可能占据制高点,获得主动。沿着这一思路,重新阐释毛泽东思想,就是要塑造一个可以与苏联意识形态相抗衡的全新的意识形态符号。当然,苏联也意识到中国树立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阵营传统秩序所产生的影响。在1960年6月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毛泽东思想宣传进行了批判,并否定了毛泽东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理论家的可能性^⑤。面对苏联的施压,中方不甘示弱。同年10月,中央军委把毛泽东思想界定为“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认为“必须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个锋利的战斗武器,发挥它的革命光芒,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以及一切资产阶级思想作针锋相对的斗争”^⑥。这一表述在党内获得认同^⑦。事实上,此时党内存在一种观念,即认为“革命的重心已移向亚非拉,革命的指导中心已移到中国,我党应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责任担当起来”^⑧。

国内外情形的变化促使1960年的毛泽东思想对外宣传形成高潮。外文出版社对每份外文刊物都提出了相应的政治任务,其中对《北京周报》的要求之一便是结合形势,“加强宣传毛泽东思想”^⑨。该刊接连发表《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大革命胜利的旗帜》和《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两篇长文,以呼应宣传形势。这两篇文章分别来自《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社论,介绍了毛泽东关于革命和战争的思想,展现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⑩。这就间接地表明了在当今世界局势下毛泽东思想所具有的“普遍意义”。

在这一阶段,《北京周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章大都译自内宣刊物,自主安排宣传内容的空间并不大,但编辑部还是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该刊首先编写了一些毛泽东会见外宾的新闻稿,比较详细地列举毛泽东的谈话,主要涉及对其他国家和地区革命斗争形势的看法、对身处压迫之中的他国民众的关心和对世界格局的分析等,比较及时地向全世界读者呈现出毛泽东回应时局的思想 and 智慧^⑪。除此之外,《北京周报》还报道了毛泽东著作在其他国家的发行与传播情况^⑫。为了配合有关“纸老虎”思想的宣传,《北京周报》特意刊登了斯特朗撰写的回忆文章,追溯她在延安采访毛泽东的情景,以及毛泽东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论点的来龙去脉^⑬,从而帮助国外读者更深入地理解毛泽东的这个思想。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正式出版,对《毛泽东选集》的宣传也成为一项重要任务^⑭。为此,《北京周报》专门刊登一篇长文,详细介绍第四卷收录的文章情况,并对重点篇目做出概述摘要,为该书的潜在读者提供了一份阅读指南^⑮。

整体上看,尽管在创刊初期,《北京周报》不可避免地受到宣传环境的影响,以翻译转载为主,原创作品有限,在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定调较高,但是,该刊并没有出现庸俗化、简单化的现象。相比之下,国内的一些刊物则采用生硬的、不合逻辑与常理的方式宣传毛泽东思想,并出现了失实报道^⑯。外宣工作之所以相对“冷静”,与中央的指导有关。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之争、国家利益之争尚未到剑拔弩张的程度,中共也需要争取更多兄弟党的支持,因此在对外宣传中不宜只谈意识形态的独创性,还要谈继承性,从而表明中共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历史传承关系。1960年初,中共中央针对宣传毛泽东思想时的内外分别特意做出说明:在对外宣传毛泽东著作的学习运动时,为避免误解,要使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提法;而在对内宣传时,可以使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表述^⑰。邓小平也对当时的宣传工作提出了批评,认为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时,庸俗化的趋势必须纠正,不能

丢掉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应过于凸显个人、违背事实^⑤。不过,外宣主要依靠内宣文章的做法,还是让一部分长期从事外宣工作的编辑颇有微词。在他们看来,单靠翻译甚至硬译中文稿,很难适应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刊登《人民日报》《红旗》上的文章,受众范围有限,主要集中于中国问题的研究者,而普通读者少有问津,这影响了《北京周报》的传播效果^⑥。编辑部内部的不同声音正在等待一个公开发表的契机。

三、外宣观念的初步澄清与宣传方式的暂时平衡(1961—1965)

20世纪60年代初期,《北京周报》部分编辑从读者的角度考虑问题,表达了对彼时宣传方式的不同意见。这种以读者为中心的思路并非对宣传环境激进化所做的反应,而是外宣工作的一个传统。长期从事对外交流的编辑们对“文化差异”问题有着比较清楚的认知,读者观念普遍比较强^⑦。用萧乾的话说,就是“成天坐在打字机前去琢磨洋人的心理”^⑧。内宣和外宣应分别对待,外宣要有自己的特点,不能照搬内宣模式,这种观念也得到宣传部门的认同^⑨。当然,外宣工作者如此考虑问题不光是为了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完成政治任务,同时也有更“实用”的动机。在他们看来,报刊不仅有宣传作用,它还是由读者付账的商品,只有从读者角度考虑问题,报刊才有市场,才能卖得出去,“这是办好报纸的根本问题”^⑩。这种看法在当时的新闻界还是比较普遍的^⑪。《北京周报》创刊以来的销售情况一直欠佳,刊物发行四年后,每期的发行量也只有8000多份,国外读者的反映并不太好,认为不符合其阅读胃口和习惯^⑫。如何提高这份理论刊物的可读性成为编辑们的一个心病,他们始终持有通过改进宣传策略以提高刊物销量的意愿。

但是,前一阶段的外宣方针淡化了外宣与内宣之间的界限,使外宣看起来就像是用外语进行的内宣。这种做法,既不符合外宣工作者的初衷,也不利于国外读者接受。在“左”的政策主导下,很多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在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中被扣上各种

帽子,暂时失去工作机会。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央强调对“左”的错误进行纠正,社会氛围有所缓和。在这一背景下,1960年下半年,外文出版社领导班子陆续进行调整,新领导上任后便开始着手恢复那些被边缘化的编辑们的工作^⑬。当时,社内“左”的外宣观念尚未得到彻底纠正,如果不组织编辑人员进行分析讨论,以后的工作将阻力重重。因此,从1961年年中开始,外文社围绕宣传思想与业务问题展开了学习讨论,以达到进一步纠“左”的目的。

从后来外文社给外文委党组的汇报材料看,当时外文社内部主要在三个问题上存在分歧。第一,宣传是否应在对内与对外之间做出分别?有人认为外宣应该根据不同国家类型、不同读者的需要,做出差异化选择,并学习目标读者国家的宣传手法;有人认为宣传应该内外一致,而非内外有别,内外有别是为资产阶级新闻观辩护,不应迁就读者,应该坚持政治立场,“以我为主”。第二,外宣的任务究竟是什么?有人认为外宣就是要争取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有人则坚持外宣应该大力弘扬毛泽东思想,鼓励世界上受压迫的人民和民族走向革命。第三,应该采取何种宣传策略?有人认为应该尽量避免暴露发展过程中的错误和缺点,以最先进、最完美的典型向世界宣传,有人则对此种理念提出质疑。^⑭

外文社领导层了解到当时外宣思想中的分歧和不当倾向,希望通过学习讨论,将外宣工作引到合理的轨道上。1961年7月,社长罗俊在全社大会上讲话,积极响应中央纠“左”精神,为随后开展的学习讨论奠定了基调。罗俊指出:对内宣传的报道直接拿来未必就适合对外宣传,这些素材要经过加工和改造,以适应外国读者的需要。在对外宣传时,不应片面强调“以我为主”,还要“照顾对方,有的放矢,讲求效果”。要做到这些,就必须重视宣传的艺术。“艺术为政治服务”不能理解为政治唯一、不要艺术,“宣传要有人听得下去、看得下去,首先是艺术形象”。至于宣传要达到的效果,罗俊坦言不应期望过甚,不要认为单凭宣传就能够指导他国革命取得胜利。宣传的调子不宜过高过急,宣传的效果也是通过长期坚

持,在潜移默化中实现的。经过一年的讨论,在最后的总结报告中,外文社就宣传中政治与艺术的关系做了进一步说明,以期从思想上扭转过度政治化的宣传方式。总结报告反复申明:对外宣传既要从政治上考虑其内容,也要从艺术上考虑其形式,不可有所偏废;外宣调子要平和含蓄,文章中不要充斥着政治术语和浮夸的词汇;要具体分析国外读者,区别对待,要时刻“树立一个外国读者的观念,即处处要为外国读者着想”。报告最后强调:“加强对外宣传艺术,是改进和提高我们工作的根本之图。”^⑤

经过此次学习讨论,外宣观念暂时得以澄清。但随着国际局势的改变,《北京周报》的编辑们发现,想在宣传实践中贯彻新观念确有难度。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面对中苏之争,亚非拉、欧洲和北美的不少共产党都选择站在中共一边,中共地位有所提升。与此同时,中苏关系经过短暂缓和后又有恶化。在1962年的苏美加勒比海危机中,中国坚定支持古巴的态度让苏联感到不满。于是在随后爆发的中印边境冲突中,苏联选择支持印度、指责中国。面对新局势,在当年7月至8月的北戴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一些争取缓和对外关系的建议被贴上“三和一少”的标签,受到批判,外事工作开始呈现激进趋势。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中共刊登了一系列批判苏共及其盟友的文章,从意识形态层面展开进攻。作为回应,1963年,苏共批评中共领导人夸大毛泽东思想之于中国革命的意义,试图“把北京宣布为新的政治中心”^⑥。中共认为这是苏共借口反对个人迷信,干涉他国内政、强加错误路线的粗暴行为,对其提出强烈抗议^⑦。7月,中苏两党代表展开了十余次会谈,就彼此分歧展开论辩。双方争论得非常激烈,很难达成共识。会谈破裂后,苏共认为“与中国人公开交手的时刻已经来临”^⑧。从1963年开始,中苏双方开始大量接待各国共产党代表团,试图向他们介绍自己的思想,批判对方的看法,以争取更多支持者。仅1963年一年,苏共就接待了90多个共产党代表团^⑨。而毛泽东在1963年和1964年接待外宾的次数也达到历史最高峰^⑩。

意识形态纷争加剧,《北京周报》作为代表官方进行理论宣传的媒体,必须对时局做出回应。在这一背景下,该刊的定位有所调整,重新凝聚的宣传观念只能在夹缝中践行。1962年11月30日,毛泽东做出批示,要求“把《北京周报》变成国际上的《红旗》杂志,变成理论资料性的刊物,作为武装国际左派的东西”^⑪。针对毛泽东的建议,中央外事小组很快做出回应,他们一方面要求《北京周报》继续译载文件、《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的文章,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能够增加编辑部改写和独立撰写的文章,以适应外国读者的习惯,并呼吁中联部、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参与《北京周报》的组稿^⑫。1963年,中方听到苏联准备用32种语言发行外文书刊、在国外设立出版机构进行倾销的计划传闻^⑬,感到必须采取针锋相对的行动。于是,《北京周报》凸显对毛泽东建议的回应,强调以国际问题为主、以政论文章为主、以译载现成文件与党报党刊文章为主,更突出“为左派服务”的功能,“推动世界革命斗争”^⑭。

时局的变化和刊物定位的调整最终影响到《北京周报》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部署。1960年12月,中央外事小组就今后几年毛泽东思想外宣工作的重点做出指示:“要大力宣传和论证毛泽东同志关于东风压倒西风、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关于被压迫人民要敢于革命、敢于胜利的思想……关于世界人民革命斗争要取得胜利,必须相互支持、加强团结、结成不包括敌人在内的广泛的反帝战线的思想等等。”^⑮1962年,时任国务院外办副主任的张彦再次强调毛泽东思想对外宣传的意义,指出:“毛泽东思想已成为国际上普遍真理,我们更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子,用各种方式积极占领思想阵地”,“要用毛泽东思想影响全世界90%的人民”,外文刊物应配合局势,加强宣传^⑯。

这一时期,《北京周报》宣传毛泽东思想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转发毛泽东的各种声明,包括支持美国黑人运动与反种族歧视斗争运动,反对美国侵略越南,支持巴拿马、日本、多米尼加、刚果(利)的反美斗争等。这些声明传递了毛泽东对世界局势的理解、

对“斗争”思想的阐述与哲思、对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关注与指导、对国际格局中不义之举的谴责与声讨,从而展现毛泽东思想如何在国际问题中发挥作用,并在世界范围内塑造一个反抗压迫、勇于斗争的正义领袖形象。这一形象对有关毛泽东的历史记忆建构影响深远,有助于增强毛泽东思想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影响力。为呼应上述宣传,《北京周报》还向世界读者介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对毛泽东思想的最新界定,强调其在国际格局中的意义^⑤。1964年“外文局^⑥工作条例”颁布,要求外文报刊“必须反复地宣传毛泽东同志对当代世界一切根本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宣传毛泽东同志指导我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一系列光辉思想”^⑦。当年和次年国庆期间,《北京周报》分别转发《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社论。前者主要论述毛泽东思想之于中国革命进程的意义,再次强调将普遍真理与地方经验相结合的必要性^⑧;后者则谈到在世界格局中毛泽东思想之于反帝反修的价值^⑨。

除了配合政治形势完成转载任务外,《北京周报》仍在探索用其他方式丰富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这一阶段,该刊不再简单地直接翻译转载毛泽东的声明,编辑们会为一些重要声明配上评论员文章或相关报道,以反映这些声明在世界范围内所产生的反响,展现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力^⑩。此外,报道毛泽东与外宾的谈话仍是传递毛泽东对世界秩序、国家间关系等问题认知的重要渠道。20世纪60年代中前期,毛泽东的外事活动明显增加,与之相关的报道数量也相应提升。另一个运用较多的宣传策略是报道国外读者阅读毛泽东著作后的积极反馈,以此反映毛泽东思想之于世界的价值和意义。例如,有人认为,毛泽东思想的意义早已超越中国和亚洲,为所有革命者提供了理论武器,并成为知识分子的宝贵财富;有人指出,毛泽东领导的农民革命经历了实践考验,其著作是实践、智慧与天才的结晶;有人断言,如果不去阅读毛泽东的著作,就无法理解政治斗争中最重要的因素^⑪。此外,为配合毛泽东著作外

文版的发行,《北京周报》会定期用专版刊登广告。

这一阶段,经过一年多的讨论学习,外文刊物逐渐纠正之前几年的激进趋势,恢复了相对温和的宣传观念,并在外文社内部取得了暂时的共识。不过,随着国际局势的紧张以及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纷争的加剧,代表官方宣传理论的《北京周报》再一次进入“战斗”状态。尽管该刊编辑试图运用更加多元的方式,更为含蓄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但政治形势并不允许进行太多革新,他们也只能尽量抵制论调过高、流于庸俗的内容。转载内宣报刊上的文件、社论、文章,仍然是毛泽东思想对外宣传的基本方式,但编辑们毕竟更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做法的局限性,也努力做出一些有益尝试。例如,《北京周报》刊登过一篇美国黑人运动领袖罗伯特·威廉斯的文章,主要谈论美国黑人运动的现状以及毛泽东发表的相关声明对他们运动的意义和影响^⑫。相比政治腔调十足的内宣作品,此类文章更适合在毛泽东思想的对外宣传中使用,其表述方式和内容也更容易被国外读者所接受。不过,这种尝试着实不多。总体上看,这几年来,《北京周报》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时,需要艰难地寻找并维持宣传方式的某种平衡。“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这种不稳定的平衡很快就被打破。

四、毛泽东思想对外宣传的曲折与纠偏(1966—1976)

外文社关于对外宣传观念的大讨论,反映出编辑们在该问题上的严重分歧。这种分歧事实上是业务与政治之间的张力未能充分化解的产物,而且尽管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才以学习讨论的形式被摆上台面、得以公开,但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继而始终若隐若现,未能得到有效解决^⑬。1962年外宣观念的澄清并未使之相反的思想心悦诚服地扭转,而只是将其暂时压制。60年代中前期,国内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热情逐渐高涨,《北京周报》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日益升温的政治氛围影响,开始加强毛泽东思想的外宣工作。

1963年社教运动开始后,全国范围内再次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1964年,军队系统编辑出

版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精神图腾——《毛主席语录》，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情陡然提升^④。1966年5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毛泽东思想的界定再次升级，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⑤。7月8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表示，尽管他并不认同对其个人及思想的各种吹嘘夸大，但为了“打鬼”事业（反修反右），只能勉强接受这种方式^⑥。两天后，他又审阅了陶铸、张平化关于中宣部工作的来信，信中提到，“今后中宣部最根本的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宣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对此表示认可^⑦。借此契机，外文局再次调整编辑方针，并对此前的做法进行批判，认为外文刊物“敌我不分，立场不明，不敢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敢突出毛泽东思想，不敢宣传革命”，“限制和阻碍宣传毛主席思想”，“照顾、迎合、迁就资产阶级读者，不是为无产阶级服务，而是为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不革命、反革命的活动效劳”，“满脑子是读者、读者，唯独没有毛泽东思想”。在此形势下，外文局于当年9月做出“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决定，要求外文刊物始终“贯穿毛泽东思想这根红线”，主要刊登下列内容：（1）体现或阐明毛泽东思想的文章；（2）国内民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文章；（3）国际友人盛赞毛泽东思想的文章；（4）毛泽东参与的活动（包括照片）、发表的声明与讲话；（5）配合文章内容选登语录。^⑧

1967年2月，“毛泽东思想外文书刊公社临时委员会”成立，全面掌控外文局党、政、财、文等方面的管理。《北京周报》具体的编辑发行工作则由“北京日报社革命生产委员会”负责。^⑨新的领导者一方面重新强调外文局的功能，认为它应是“我党、我国通过外文书刊向全世界人民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主要革命阵地”，“永不变色的红色宣传阵地”^⑩，另一方面开始清算先前的宣传观念。这些造反派对当时已停止工作的原外文局领导层和《北京周报》总编辑进行批判，认为他们打着“内外有别”的旗号，提倡“让事实说话”“让读者自己下结论”“不要刺激读者”之

类的说辞，“阉割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根本任务和根本途径”^⑪。造反派们特别指出：身为党和国家外交喉舌的《北京周报》受到了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外交观念的影响，不敢理直气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拒绝使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毛主席万岁”等表述^⑫。造反派的激烈言辞鲜明地反映出两种不同外交观念之间长期存在的冲突——“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激进观念扭转局面，重新占据主动。

在这一背景下，《北京周报》的内容有了大幅调整，基本上遵照1966年9月外文局所提出的编辑方针，展开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核心是展现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该刊专门开设题为“毛泽东思想照耀全世界”（Mao Tse-tung's Thought Lights the Whole World）以及“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The World's People Love Chairman Mao）的专栏，用以展现世界各地民众是如何热情高涨地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专栏报道旨在传达以下信息：毛泽东是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是全世界解放运动的灯塔，给各国人民带去力量；他的著作和语录畅销全世界，读者众多，大家突破封锁、争相传阅、受益匪浅，成为指导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各国共产主义运动领袖高度肯定毛泽东思想之于中国革命以及世界新秩序的意义和价值。例如，1967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来自世界各地的进步作家和文艺工作者聚集北京，畅谈讲话对文艺创作的指导作用以及对革命文学乃至革命事业的不朽价值。《北京周报》刊登与会者的发言记录，借国际友人之口传递出毛泽东思想超越国界的深远影响^⑬。这些专栏有时会配上图片，或展示各国民众手捧《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专心阅读、沉醉其中的场景，或表现各国民众对毛泽东画像的崇敬与爱护。随着《北京周报》持续性的集中宣传，毛泽东的著作、语录以及画像成为毛泽东思想走向世界的象征符号。

除了设置专栏外，《北京周报》仍以转载内刊文章或刊登相关评论的方式宣传毛泽东思想，只是频率较从前大幅提高，且所使用的表述方式完全是从

内宣语言直接硬译而成的,不再顾及国外读者是否适应这种“疏离的母语”。“文化大革命”高潮阶段,该刊数次转载《解放军报》等报刊的社论,阐述毛泽东思想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深远意义”^⑧,进而号召世界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与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路线斗争到底。

这一时期,《北京周报》着力完成的另一项任务是向全世界宣传中国人民如何开展毛泽东思想学习运动。例如1966年,该刊转载《哲学研究》刊登的《对立统一规律一百例》中的19篇文章,这些文章均出自工农兵群众和基层干部之手,向读者展示了普通中国人如何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为其他国家民众的学习提供了参考^⑨。

相比于之前两个阶段,本阶段的《北京周报》更加注重对毛泽东思想内容本身的宣传,重新刊登了许多曾以单行本或收入《毛泽东选集》等形式向全世界发行过的文章。例如从1966年到1969年,该刊先后刊登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人民服务》《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炮打司令部》《青年运动的方向》。此时重刊旧文,主要是为了强调它们的重要性。《北京周报》还经常结合时事刊登毛泽东的最新声明和谈话。当然,此时毛泽东思想对外宣传最重要的方式莫过于呈现《毛主席语录》,语录也成为很多外国人感知毛泽东思想最便捷、直观的途径。1967年第八期(2月17日)起,《北京周报》开始用整版篇幅刊登摘自《毛主席语录》的语句,或者发布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一般放在第二页,位置非常醒目,条目选择上也已不局限于之前提出的“配合文章内容选登语录”。为了进一步凸显毛泽东的形象,该刊经常在第三页用整版的篇幅发布毛泽东的独照^⑩,形成语录或指示与毛泽东像并列的排版效果。可以说,在“文化大革命”高潮阶段,《北京周报》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将凸显仪式感放在了重要位置上。

《北京周报》宣传风格骤变,引起外国读者的负面反响,他们通过不同渠道表达了不满。1966年11

月3日,该刊负责人与哥伦比亚“工学农运动”代表团进行座谈,哥方认为《北京周报》“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时,在语言方面用了一些简单的肯定,并未给予具体的阐述和解释。这样宣传的后果,使读者产生反感”^⑪。1967年3月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访华时批评了中国的外宣工作,认为中方主办的外文刊物所采用的宣传方式和语言与英语国家读者的习惯格格不入;11月他又委托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转告中国,要“注意防止大国沙文主义”^⑫。希尔自己也抱怨说,他们的仓库堆满了积压的《北京周报》^⑬。美国《远东通讯员》发行人兼主编陆慕德女士在同《北京周报》等媒体负责人座谈时,表示对“文化大革命”高潮阶段《北京周报》的宣传风格记忆深刻,批评其“八股调,枯燥无味”,“把许多读者都吓跑了”^⑭。

国外目标读者的反应引起中央高层的重视与警惕。1967年2月,周恩来视察外宣工作时指出,对“文化大革命”宣传的调子过高,会让其他国家产生不必要的恐惧,反而不利于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照耀”^⑮。同年6月,毛泽东对外宣工作提出批评:“有些话何必要自己来说,我们要谦逊,特别是对外,出去要谦逊一点,当然又不是失掉原则。”^⑯1968年,毛泽东再次强调:对外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⑰。这一时期,毛泽东至少有数十次修改各种涉及外宣的稿件——删除里面对毛泽东思想评价过高的表述。他还多次在公开场合,特别是涉外会晤中强调对其个人及思想的宣传应该克制、实事求是。毛泽东等人的态度,特别是对外宣工作的持续批评,迫使《北京周报》做出调整。从1968年开始,该刊直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文章开始减少;到1969年,相关主题的文章数量大幅下降,不及巅峰期的一半。

1970年之后,面对始料未及的国内动荡局面,毛泽东开始考虑重建秩序,加之1971年林彪折戟温都尔汉,这场持续数年之久的造神运动基本宣告终结。在国际层面,中美邦交正常化工作的开启也意味着意识形态的激烈对抗要有所缓和。国内外形势

的变化直接反映在《北京周报》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方式上。从1970年开始,该刊很少在文章标题中出现“毛泽东思想”的字眼。1972年到1975年只出现过一次,还是介绍一本日本左翼创办的题为《毛泽东思想》的刊物。到了毛泽东逝世的1976年,《北京周报》才又出现了几篇以毛泽东思想为主题的文章。另外,从1971年第四十五期(11月3日)开始,《北京周报》取消了“毛主席语录”板块,最后的仪式性内容亦不复存在。该阶段,《北京周报》对毛泽东报道最多的是其外事活动,保留了刊登大幅照片的做法。也就是说,1970年之后,毛泽东思想更多通过毛泽东的形象向世界传播。

五、结语

胡乔木曾经指出,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有两种形象:一种形象诞生于中国革命,曾经让第三世界乃至资本主义国家“认为中国革命给世界展现了一个新的光明前景,提供了一个新的前途”;另一种形象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国际反修斗争激烈化之后,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一形象给人们带来的印象不尽相同,但多数执政党都很难认同这样一种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位^⑥。毫无疑问,《北京周报》是第二种毛泽东思想形象建构过程的重要参与者,也见证了这一努力的最终命运。

《北京周报》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随着外宣观念的变化而左右徘徊,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始终未能找到自洽的位置和理想的方式。毛泽东思想对外宣传过程中遇到的困境是整个外宣工作的缩影,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这种困境。第一个层面关乎认知,那就是外宣到底首先属于政治任务,还是要把遵循市场原则摆在第一位,将外宣刊物视为待售商品。实践中,《北京周报》始终在这两极之间摇摆,无法完成准确定位。一方面,该刊纠结于发行量无法迅速提升,一直努力拓展海外发行渠道^⑦。为了适应外国读者的阅读习惯,编辑对选题与措辞均非常谨慎,生怕引起潜在受众反感。另一方面,《北京周报》又不断明确“经济账为政治账服务”的方针,以政治效果为主要考量,因此发行中很大一部分属于

非贸易渠道,主要靠免费赠送。例如,1965年《北京周报》的非贸易发行份额达到46%^⑧。从实际效果看,《北京周报》承担的政治任务超过市场任务,大量杂志实际上积压在各国海关,未能进入市场^⑨,并且其语言表述始终让国外读者觉得比较呆板、可读性差^⑩。

对于上述局面,可以进一步从意识形态层面进行理解。表面上看,在政治与市场之间纠结不清的重要原因在于:1949年之后,宣传领域始终未能解答一个关键问题,即社会主义国家办报与资本主义国家办报到底应该有何区别。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层面的困惑一直徘徊在从业者脑中,令他们苦恼不已,外宣观念的摇摆不定即与此有关。中共高层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亦很难条理清晰地落实到实践层面^⑪,这无疑会对从事具体工作的人造成约束。更进一步看,新中国建立对外宣传网络,实际上是主动参与到“文化冷战”的进程之中——外宣机器开动伊始,就带有明确的政治任务。这种政治任务是在“敌-我”二分的认知框架下展开的,因此,能否完成外宣工作被提高到了关乎胜败存亡的高度。“敌-我”框架首先被应用于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这也是“文化冷战”的基本类型。不过,受自身阵营结构性质的影响,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之间实际上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由此引发的矛盾冲突使得阵营内部进一步衍生出新的“敌-我”关系,同样存在激烈的意识形态纷争。这构成了“文化冷战”中的亚类型。1958年之前,中国的外宣工作主要是在基本类型的范畴中展开,以“反美”为主要宣传目标;1958年之后,中国成为亚类型冲突中的关键一方,肩负着反美、反修、争取盟友的三重负担。面对繁杂的政治任务,以《北京周报》为代表的外宣刊物必须兼顾多方,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非常有限;对于外界的反应,外宣也比内宣更加敏感。

外宣工作更深一层的羁绊恐怕还是来自新中国在理解自身之于世界格局之地位时的焦虑与紧张。近代中西碰撞开始以来,如何处理自身与他者的关系便成为中国人在思想层面所面临的核心议题之

一。传统的秩序观在外来力量的不断冲击下早已失去了继续维系的土壤和社会心理,一个基于现代国家体系之上的处理“我-他”关系秩序的常态亦未像理想中那样如约而至。身处由民族备受侵略的历史记忆、新中国终获独立的豪情壮志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文化熏陶和特殊国家关系观所共同构成的重重迷雾之中,身份上已经独立的中国还很难在民族心理上一蹴而就成熟起来——在处理自身与他者之间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不稳定性,正是这种不成熟的直接反应。1958年毛泽东思想被赋予超越中国语境的“普遍意义”后,国人一方面受到未来愿景的感召,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与兴奋,迫不及待地要与世界分享中国道路的优越性;另一方面,长达百余年的挫败经历所造成的深植于内心的不自信以及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又使我们底气不足,在向世界展现自身时,总是充满踟躇犹豫、彷徨不安。这种渴望展示与自我压抑的紧张状态,构成了当时中国对外表达的根本困境。

注释:

①参见习少颖:《1949-1966年中国对外宣传史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年;姚遥:《新中国对外宣传史:建构现代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

②参见徐锋华:《〈中国建设〉的创办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外宣传》,《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5期。

③考虑到毛泽东时代的具体语境,本文在讨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时,主要涉及两个层次:一是内容的宣传,即毛泽东相关论述与著作的传播;二是价值和意义的宣传,即展现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对世界其他民族和国家的贡献以及国外民众的反馈与评价。

④参见雍桂良:《毛泽东著作在国外的出版与传播》,《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93年第4期;郭选:《毛泽东著作外文版出版纪事》,《对外大传播》1996年第12期;杨敏:《“伦敦版”英译毛选的诞生》,《发展》2014年第10期;刘火雄:《毛泽东著作海外传播流变》,《对外传播》2014年第3期;Xu Lanjun, "Translation and Internationalism", in Alexander C. Cook ed., *Mao's Little Red Book: A Global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76-95.

⑤《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新星出版社,1999年,第188、357页。

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页。

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73页。

⑧《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1),新星出版社,1999年,第1页。

⑨参见《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第38、45-47、57页。

⑩参见《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42-343、352页。

⑪此类文件很多,不一一列举。相关文件散见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4、7、9、14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

⑫参见美]沙培德著,高波译:《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页;[美]詹姆斯·布莱德利著,林添贵译:《中国幻象:美国亚洲劫难的历史和真相》,八旗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346-351页。

⑬《萧乾全集》第5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50页。

⑭参见陈日浓编著:《中国对外传播史略》,外文出版社,2010年,第122-123页。

⑮参见《党的宣传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1951-1992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第9-11页。

⑯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98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1页。

⑰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380页。

⑱参见《中国之窗世界之友——北京周报的发展历程》,内部资料,1998年,第14-15页。

⑲参见《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第124、129、133、156、188-189页。

⑳《党的宣传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1951-1992年)》,第187页。

㉑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2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9-21页。

㉒《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4册,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177页。

⑳参见《青山在——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迎接外文局成立60周年纪念特辑》，内部资料，2009年，第114页。

㉑参见《书刊对外宣传的理论与实践》，新星出版社，1999年，第52页。

㉒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10册，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年，第388—392页。

㉓《共同走过的路——“我与外文局”征文选》，内部资料，2009年，第188页。

㉔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8页；沈志华：《中共八大为什么不提“毛泽东思想”》，《历史教学》2005年第12期。

㉕参见沈志华：《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a1959）》（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66—577页。

㉖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05、335、455、586页；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9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第206页。

㉗《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257页。

㉘《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802页。

㉙参见萧冬连：《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482页。

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9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24—225页。

㉛Comrade Mao Tse-tung on "Imperialism and All Reactionaries Are Paper Tigers", Peking Review, 1958, Issue 36/37. 中译文参见《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日报》1958年10月31日。

㉜《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第156页。

㉝参见 Lin Piao, March Ahead under the Red Flag of the General Line and Mao Tse-tung's Military Thinking, Peking Review, 1959, Issue 40.

㉞参见 Letter from Comrade William Z. Foster to Comrade Mao Tse-tung, Peking Review, 1959, Issue 5.

㉟参见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8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第369—372、398—401页；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66—68页。

㊱《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91页。

㊲赫鲁晓夫认为，毛泽东“不愿意考虑其他人的经验”，其理论创新不会被其他国家接受，甚至可能给中共和国际共运带来负面影响。参见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155—156页。

㊳《军队政治工作学习文件》，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8年，第94、96页。

㊴萧冬连：《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下），第490页。

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82页。

㊶《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第172页。

㊷参见 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 Is the Victorious Banner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Peking Review, 1960, Issue 40; Lin Piao, The Vic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Revolutionary War Is the Victory of 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 Peking Review, 1960, Issue 41.

㊸参见 Chairman Mao Meets Leaders of Fraternal Latin American Parties, Peking Review, 1959, Issue 10; Chairman Mao Meets African and Latin American Guests, Peking Review, 1960, Issue 19; Chairman Mao Tse-tung: "There Are High Hopes for Japan's Independence and Freedom", Peking Review, 1960, Issue 26.

㊹参见 Chairman Mao's Works in Icelandic, Peking Review, 1959, Issue 52; Chairman Mao's Works Abroad, Peking Review, 1960, Issue 22.

㊺参见 Anna Louise Strong, Reminiscences on Interview with Chairman Mao Tse-tung on the Paper Tiger, Peking Review, 1960, Issue 48.

㊻《党的宣传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1951—1992年）》，第191页。

㊼参见 Volume IV of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Peking Review, 1960, Issue 40.

㊽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6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53—356页。

㊾《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3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页。

㊿参见《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4册，第184—185页。

①《书刊对外宣传的理论与实践》，第265页。

⑤⑤参见《青山在——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迎接外文局成立60周年纪念特辑》，第62页；于友：《刘尊棋》，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第53—55页。

⑤⑥《萧乾全集》第5卷，第232页。

⑤⑦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22—224页。

⑤⑧赵凯主编：《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页。

⑤⑨参见郑重：《毛泽东与文汇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xii页。

⑥⑩《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第210页。

⑥⑪参见《青山在——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迎接外文局成立60周年纪念特辑》，第115—118页。

⑥⑫参见《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第236—256页。

⑥⑬《书刊对外宣传的理论与实践》，第33—37、39—54页。

⑥⑭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0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第51页。

⑥⑮《阎明复回忆录》(二)，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790页。

⑥⑯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0卷，第233页。

⑥⑰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0卷，第288页。

⑥⑱根据笔者对《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所记载的毛泽东外事活动的统计，其在1963年和1964年接见外宾的次数为历年来的最高值。

⑥⑲《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71页。

⑦⑩参见《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第282—283页。

⑦⑪《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第286页。

⑦⑫《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回忆录》，新星出版社，1999年，第104页。

⑦⑬《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回忆录》，第64页。

⑦⑭《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第209页。

⑦⑮参见 Political Work in the P. L. A., Peking Review, 1963, Issue 21. 该条例对“毛泽东思想”的界定如下：“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参见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第169页。

⑦⑯外文局全称“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于1963年正式成立，负责外文书刊的出版发行以及对外宣传等事务。

⑦⑰《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第352页。

⑦⑱参见 Hold High the Revolutionary Banner of Mao Tse-tung's Thinking, Forge Ahead!, Peking Review, 1964, Issue 40.

⑦⑲参见 Hold High the Great Red Banner of Mao Tse-tung's Thought and Courageously Drive Ahead, Peking Review, 1965, Issue 40.

⑧⑩参见 Commemorating Chairman Mao's Historic Statement, Peking Review, 1964, Issue 33; Chairman Mao's Statement Wins World Acclaim, Peking Review, 1965, Issue 21.

⑧⑪参见 Japanese Translation of Chairman Mao's Works, Peking Review, 1961, Issue 49; Studying Chairman Mao's Works Overseas, Peking Review, 1965, Issue 46.

⑧⑫“Mao Tse-tung's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for Afro-Americans”, Peking Review, 1963, Issue 35.

⑧⑬参见《萧乾全集》第5卷，第226页；李辉主编：《冯亦代自述》，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207—222页。

⑧⑭参见韦梅雅：《在红彤彤的世界里——〈毛主席语录〉兴衰实录》，中港传媒出版社，2015年。

⑧⑮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内部资料，1988年，第23页。

⑧⑯《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97页。

⑧⑰《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98页。

⑧⑱《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第404—405、395—396页。

⑧⑲《毛泽东思想外文书刊公社临时委员会宣告成立》，《红色造反报》1967年2月11日。

⑨⑩《给毛主席的致敬信》，《红色造反报》1967年2月11日。

⑨⑪《打倒外文局第一号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罗俊》，《红色造反报》1967年2月11日。

⑨⑱《把外文局党组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砸个稀巴烂》，《红色造反报》1967年2月11日。

⑨⑲参见 World Enters New Era in Which Mao Tse-tung's Thought Is the Great Banner, Peking Review, 1967, Issue 26/27.

⑨⑳参见 Raise High the Great Red Banner of Mao Tse-tung's Thought and Carry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Through to the End, Peking Review, 1966, Issue 29; Hold High the Great Red Banner of Mao Tse-tung's Thought, Thoroughly Criticize and Repudiate the Bourgeois Military Line, Peking

Review, 1967, Issue 32.

⑮参见 Workers, Peasants and Soldiers Creatively Study and Apply Mao Tse-tung's Philosophical Thinking, Peking Review, 1966, Issue 21-23.

⑯这种做法从1966年第38期(9月16日)开始盛行起来,中间几乎没有间断,直到1968年第28期(7月12日)以后,才逐渐减少,隔几期出现一次。其间偶尔也会出现毛泽东与林彪的合照,例如1967年第41期、1969年第1期等。

⑰《中国之窗世界之友——北京周报的发展历程》,第157页。

⑱《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54页。

⑲《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回忆录》,第109页。

⑳《中国之窗世界之友——北京周报的发展历程》,第159页。

㉑《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第411页。

㉒《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93页。

㉓《毛主席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批示(1967.3-1971.3)》(1972年6月8日印发)。

㉔《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版)》,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5-46、90页。

㉕参见《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第283页。

㉖《中国之窗世界之友——北京周报的发展历程》,第157页。

㉗《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回忆录》,第35页。

㉘《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第427页。

㉙例如,毛泽东在1957年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总比资本主义的报纸好”,“我们的报纸毒少,对人民有益”;社会主义报纸刊登的文章不应如资本主义报纸那样软,但也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的好坏,要看效果”。这些道理固然完全正确,但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很难准确把握其中的“度”。参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第190-191页。

A Study of External Publicity on Mao Zedong Thought Based on *Peking Review*

Zhang Fang

Abstract: From its initial issue, *Peking Review* has shouldered responsibility to disseminate propaganda about Mao Zedong Thought throughout the world. Before the onse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journal mainly publicized Mao Zedong's views on the world situation and the world order by forwarding editorials, declarations, and announcements to issue relevant reports and comments.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its external publicity about Mao Zedong Thought, *Peking Review* began to reveal the radical trends, attempting to highlight a sense of ritual. However, based on feedback from foreign readers, high-level CPC leaders intervened in this type of publicity. The dilemma in the process of disseminating propaganda on Mao Zedong Thought was to represent the epitome of all propaganda work, which can be understoo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knowledge, ideology and foreign relations.